

赵逵夫 主编 诗赋研究丛书

汉诗研究

● 郑文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赵逵夫 主编
诗赋研究丛书

汉诗研究

郑文著

凉
赵逵夫
书于
甘肃民族出版社

山东省图书馆藏

著者印



甘肃民族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 02 号

责任编辑:陈景明

封面设计:姜建华

诗 研 究

郑 军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西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26 插页 1 字数 280,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21-0342-3/I.67 定价:9.4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
PDG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 逵 夫

文学的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这是因为，虽然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汉语的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序词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缓急轻重及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种可以比拟。

又由于一字一音的方块汉字的特征，中国诗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作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仗、骈俪的艺术美因素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①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太多，但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②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所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丽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国文化之特质的，是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集结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着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说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及樊川、玉溪，岂止是诗坛神笔，实亦是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辄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出一套《诗赋研究丛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31页。

② 如黑格尔认为，哪些民族的诗较发达和成熟，同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有关。他说：“在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之中又有某些比另一些更适宜于诗，例如东方的意识比西方的（希腊的是例外）就较适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的，固定的，统一的，有实体性的东方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种观照方式本来就是最真诚的，尽管它还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见同上27页。

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新的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对作品的整理、诠释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作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序

余治汉诗，始于六十年代。所为《全汉诗笺》，已告完竣，惟所据原文为丁福保氏《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本，校而未精，辑而未全，不及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本之善。拟据逯本以改初作，又觉全汉诗堪称菁华者，不过二百首许，与其玉石并存，何如排沙简金！乃选一百九十九首，而名之曰《汉诗选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所为《汉安世房中歌试论》、《驳铙歌十八曲都是军乐说》、《论“枚乘诗”》、《论所谓汉武帝秋风辞》、《论太初正历以前汉用夏正》、《论李陵与苏武三首的假托》、《论所谓班婕妤怨歌行》、《王昭君怨诗试论》等总题为《汉诗研究》，1981年由西北师范学院印行，作为交流教材。后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浅论》、《汉诗管窥》、《蔡文姬没于胡中考略》、《汉郊祀歌浅论》，分别刊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兰州大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西北师学报》及中华书局《文史》。因思世之前有关汉诗著作，大都偏于乐府诗；论述乐府诗者，大都屏弃庙堂之作，而所有《中国文学史》虽兼及乐府诗以外之诗歌，而语焉不详，更无唐诗、宋诗之有专著。不自量力，成《汉代诗歌》，1984年毕事。自惭浅陋，未敢示人，置之櫝中，以待修正。岁月如流，时不我待，八十之年，忽焉过二，桑榆晚景，不能不惧！藏拙无闻，献曝问世，权衡取舍，吾用后者。倘能获玉他山，匡所不逮，岂直暮齿沐辉而已乎？

1982年8月郑文序于西北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汉代诗歌·····	(1)
绪论·····	(1)
乐府诗·····	(16)
朝廷乐章·····	(22)
安世房中歌·····	(23)
郊祀歌·····	(31)
乐府古辞·····	(54)
鼓吹曲辞·····	(57)
相和歌辞·····	(67)
杂曲歌辞·····	(91)
杂歌谣辞·····	(98)
汉诗·····	(117)
杂言诗·····	(117)
汉初的杂言诗·····	(117)
武帝时及其稍后的作品·····	(122)
东汉时期的作品·····	(144)
五言诗的起始·····	(151)
论所谓枚乘诗·····	(152)
论所谓李陵诗·····	(166)
论所谓班 婕妤的《怨歌行》·····	(177)
五言诗的形成·····	(185)
五言诗·····	(190)

古诗十九首·····	(192)
《十九首》以外的现存古诗·····	(205)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210)
从班固到蔡琰·····	(223)
四言诗·····	(234)
四皓及所谓四皓诗·····	(235)
西汉的四言诗·····	(244)
东汉的四言诗·····	(250)
结论·····	(252)
驳《汉铙歌十八曲》都是军乐说·····	(264)
论太初正历以前汉用夏正·····	(297)
汉诗管窥上·····	(313)
乐府古辞·····	(336)
汉诗管窥下·····	(343)

汉代诗歌

绪论

秦末逐鹿中原，汉高帝刘邦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此我国进入了巩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期。由于“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下同）采取了恢复生产与安定生活的政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原作子，依《史记·平准书》改）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高后、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也日益富强。到了武帝即位的时候，诚如《史记·平准书》所载：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庾廩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嫫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在这样富厚的基础之上，雄才大略的武帝刘彻，才能塞决河，兴礼乐，南平南粤，北逐匈奴，东灭朝鲜，西通西域，招东瓯，来闽

越，开发西南夷。这固然使得大汉的声威远扬世界，但“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居者送，中外骚扰”（《史记·平准书》、下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信神仙，事封禅、兴宫室、喜兴作、尚奢侈，好珍奇，耗费皆以亿计，遂使国力空虚，吏治败坏，甚至卖官鬻爵，人口减少。“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 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铁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因此，另铸新币，收盐、铁、铸钱为官营，并“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 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下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这样一来，中等以上的商贾人家大都破产。这对于豪强兼并之势，虽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互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无限。”（《汉书·食货志》、下同）这种情形，就造成董仲舒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他们“又觝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小民“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逃亡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由此可见，汉代对小民统制的严酷，也可见当时豪强对小民的刻削，更可见小民在怎样困苦中讨生活。

不过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毕竟是汉代最具关键性的皇帝，他为我国的疆域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为我们的民族博得了相当的声誉，在文化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时期，他就是这个时期的总代表，虽然付出的代价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但他晚年发现了这样的情形，决定与民休息，社会又逐渐稳

定了下来，汉朝也继续前进了。

昭帝、宣帝执行了武帝晚年的政策，宣帝更能循名责实，整顿吏治，北服南匈奴，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元帝柔仁懦弱，权力下落，上层豪强的贵族地主，下层豪强的富有地主，都大大扩张势力，兼并土地与争夺奴隶，而所依赖的许、史外家，既不了解民情，更不关心民瘼；加上弘恭、石显，狼狈为奸，排挤正士不遗余力，致使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京房、陈咸、贾捐之等都先后论罪。这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统治力量，逐渐松弛下来，简直没有再兴的气象了。

西汉国势，元帝时开始走下坡路，还没有到大坏的程度。经过成帝这一代的统治，逐渐走向崩溃，而且崩溃的速度愈来愈快。他的荒淫奢侈，既过于武帝，他的暗昧不明，优柔寡断，更甚于元帝。外戚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至当权的人，兄弟相传，叔侄相继；趋炎附势之徒，奔走其门，希图固位与迁升。因而形成不能动摇的势力，他自己自然就被孤立了，地位也就不巩固了。不过，当他看到王家的土山渐台的时候，一发脾气而王音籍藁，诸舅负质；可见那时他的权威犹在。倘下决心整顿，还是可以有为的。但他上受母后的挟制，而自己又宠任便嬖，溺于女色，喜欢微行，不理国政，“轻夺民财，不爱民力，……发徒起邑，并治宫殿，大兴徭役，重征赋敛，微发如雨，役百乾巽，费偃骊山，靡敝天下。……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娄降，饥谨仍臻，流散冗食，饿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汉朝到了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希望？

继承成帝的是哀帝。他想除去王氏而以丁、傅两家代替他们，打算强立主威，以武帝、宣帝做榜样。曾经罢乐府；定限田之法；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纨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门官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禁郡国毋得献名兽，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残贼酷虐者以时退；

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初陵勿徙郡国民，似乎要振作起来做一番事业。但丁、傅两家专权不减王氏，他自己又宠爱董贤，做些不伦不类的丑事。这时人民贫困，赋敛繁重，制度奢泰，官吏不良，风俗衰薄，天灾流行。鲍宣说民有七死、七亡，都由公卿、守、相贪残成习所致。至于上、下两层豪强兼并土地与争夺奴隶，愈演愈烈，而土地的高度集中与奴隶的无限增加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如果想用改良的措施与欺骗的手段，岂止不能解决危机，而且只是激化社会的矛盾。这就是西汉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也是西汉末年社会发展的必然归趋。

《后汉书·循吏传序》说：

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穡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籞之官，废驰骋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鍾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

当时经过农民起义，群雄纷争。国民十分凋敝，人口大减；边陲萧条，鄣亭毁坏，只有俭用节费才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勤劳办事。才能减少人民的痛苦，整肃官风，才能抑制官吏的贪污。这是大乱之后的形势使然，也是开国君主必须采取的政策。至于恢复三十而税一及五铢钱，释放奴婢及裁减兵员，都是有益人民的事，无愧于中兴令主之所为。

明帝继续执行光武的政策，赋税徭役既较轻，对外战争也较少，无论上层豪强或下层豪强，还惧怕皇帝的权力，因而不得不有

所收敛，不敢公开横行无忌。是以明、章两代的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发展也比较迅速，人民的生活也有一些改善。所以《后汉书·明帝纪论》曰：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佞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量未优乎。后来章帝即位，废明帝苛刻，事从宽厚，纳陈宠的疏言，除惨狱的科条，于是外戚、宦官，得到优厚的待遇，开始窃权弄柄，作歹为非。自他死后，东汉的政治，便步入了黑暗之中。

考章帝年十九即位，年二十四岁而死；和帝年十四即位，年二十七岁而死；殇帝生仅百日即位，明年即死；安帝年十三即位，年二十八岁而死；顺帝年十一即位，年二十九岁而死；冲帝年二岁即位，年三十岁而死；质帝年八岁即位，年九岁而死；桓帝年十五即位，年二十八岁而死。由此可见，东汉自章帝开始，年都不长；死了以后，继嗣冲幼，政由母后，母后临朝，必用外戚。外戚秉政，目无幼主，跋扈骄奢，为所欲为，或植党以营私，或作威而作福。及帝既长，势所不堪，而长于深宫之中，狎于近侍之人，因而参预密谋策画以诛除外戚的只有宦官。宦官因除外戚有功，赐爵封侯，迅速扩张势力，布于中外。所以《后汉书·宦者传序》说：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慙，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珥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闼之间，不得不委任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

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勳，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意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可见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大势力，虽互为消长，而宦官的势力则大于外戚的势力，所谓朝官，则依违于两大势力之间，即使名为大臣，也处于无权的地位。论其罪恶，言其流弊，那两者都不能逃避责任。所以仲长统说：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弩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所致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至于因此而导致吏治的败坏，则在左雄所上奏疏中，说得特别深切：

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彫敝，功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复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疫，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复，竞共辟召，踊趯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厮）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后汉书·左雄传》）

正因这样，弄得“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

朝夕之餐，所虑靡盬之事。……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后汉书·刘陶传》下同）。有人料到：“卒有役夫穷匠，起于版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就会使“八方分崩，中夏鱼溃”。果然，人情多怨，腹诽口祝，进而危言深论，不避豪强；进而共为部党，诽讪朝政。汉朝为了箝制舆论，大兴党狱，辞所牵连，及于名士、经师；而诸为怒隙的人，因相陷害，睚眦之怨，滥入党中；加上州郡承旨，竟有未尝交关，也遭毒害。因而死徙废禁的人，不计其数。于是钜鹿三公将军，著黄巾以为标帜，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不可收拾了。

汉高帝刘邦起自田间，文化知识本来不多，对于文人是瞧不起的。自以为马上得天下，要什么诗书？经陆贾告以不能马上治天下，因而叫陆贾为他“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及古成败之国”（《汉书·陆贾传》），叫做《新语》。又，汉初没有朝仪，群臣争功，醉或妄呼，按剑击柱，简直没有秩序，叔孙通和他的弟子共起朝仪，高帝“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汉书·礼乐志》），但仍然没有设立学校教育儿童，而挟书的律令，直到惠帝时才解除。“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故诸博士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儒林传序》）不过在文景的时候，却出现了几个相当有造就的作家，这就是贾谊、晁错、邹阳、枚乘和严忌。

贾谊的年龄虽然不大，既有文才，更富远见；既通诸子百家之书，更理解全盘的国家形势。他的《陈政事疏》，精明地分析了当前的政治情况，深刻地指出了存在的政治危机，明白地提出了解决方案。他的目的固然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客观上对人民的安居乐业具有积极的意义。自然，他的政治理想，仍不脱儒家的窠臼，他的看法毕竟明确，深邃而富条理，没有一般儒者那样迂腐空泛的习气。加上情绪激昂，行文流畅，使读者不但服其理由，而且赏其文辞。可惜绦、灌、东阳侯、冯敬之徒都是赳赳武夫，目光短浅，知守成

而不知变化，轻年少而嫉其才华，而文帝也只知注意鬼神之事，并不能真正用他，虽然采取了他的一些建议，终于疏远了他。他既被远谪于长沙，复为傅于梁王。他所作的《吊屈原赋》，实际是借吊屈原而吊自己，《服鸟赋》似乎是在解脱自己了，实际在抒发他怀才不遇的郁闷。至于《过秦论》三篇，明为过秦，实则过汉，“殷监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如果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也就可以理解《过秦论》的含义了。他用写赋的方法写论，所以渲染铺陈，有声有色，纵横家的影响，显而易见。

晁错本学申商刑名，不以文学著称，他的文章，颇象他为人的耿直深刻。看他谈兵事，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以及对策等文，既具创见，更有措施；既有分析，更符实际，和那些连篇累牍都是“诗云”、“子曰”自然不同，和那些千词百语都是阿谀奉承更异其趣。如果不以成败论人，应该列他为当时第一流的政论家。

一般文学史都不提邹阳，《汉书》却把他与枚乘同传，而载“吴王濞招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又载他书谏吴王，吴王不纳，他就和枚乘、严忌去而之梁。羊胜、公孙诡恶之梁王，下于狱中，他在狱中上书自明。这两篇文章，都选入《昭明文选》之内，颇得后人的好评。

枚乘的《七发》，针对当时贵族的腐朽生活而加讽刺，从音乐、饮食、车马、宫室、田猎、观涛等事启发太子，而归结于“要言妙道”，以转变他的志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太子因而“潏然汗出，霍然病已”。就艺术表现说，确实是“楚骚流派，分条侈说，全祖《招魂》，然笔力苍劲，自是西京格调。其驰骋处，真有捕龙蛇、搏虎豹之势，允为千古杰作”（《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说），而观涛一截，更是蔚为奇观，使读者精神为之振奋。他的《谏吴王》两书，都为劝阻吴王谋反而作，前者由于反形未著，故广设譬喻，陈说安危之理，使之警悟；后者在其举兵之日，故明陈安危，望其罢兵。两篇多用排偶，颇有辞赋之风。